

第一章 近代翻译的发轫

—— 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

一、列强入侵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一）西方重炮下震颤的中华帝国

18~19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经过英国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新兴的资本主义用以摧毁欧洲封建制度的重炮——机器大工业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成了改造世界面貌的强有力的武器。在这个武器面前，任何抵抗力量都是无济于事的。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输出的扩大，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夜时，非洲、大洋洲、西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中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已经或正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那里的国家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蜕变的痛苦，那里的人民正饱受着两个不同层次文明形态转换的煎熬。

有着辽阔国土、丰盈物产、众多人口的中国，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垂涎的对象。利物浦印度协会于 1836 年 2 月上英国首相迈尔本的备忘录中说：“须知对华贸易，事关六百万英镑资本，九万吨航运，四百万到五百万英镑的税收。”^① 而对华鸦片贸易税收成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收入，1830 年印度政府鸦片税收已占总收入的 1/10。为了打开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财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惜冒着发动侵略战争的风险。

而面对世界风云的激荡，中国却全然不知，东方巨人正步入“四海变秋气”的“衰世”。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这时的社会生产力虽有了提高，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已出现，但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却长期停滞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多大变化。

嘉庆(1796~1820 年)以后，封建统治者极端腐败。政治愈加黑暗，军备废弛，财政拮据，土地兼并极为严重。乾、嘉之际，大学士和珅有田地 8000 余顷，当铺、银号、古玩店遍布各地。至于占地几千、几万亩的地主就更多了。地主阶级就是凭借其所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每年收入的 50% 以上被地主夺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反封建反压迫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白莲教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有两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转引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 页。

次，搅得统治者心神不安，大清帝国已陷入危机之中。

就在这时，西方侵略者的炮声轰响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极为不义”的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手足无措，节节败退，1842年8月29日，不得不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接着，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二）中国内部应变的思想动因——经世致用思潮

清朝的失败，震惊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堂堂的“天朝上国”竟败给了“蛮夷小国”，是天朝太衰落了，还是“蛮夷”太强大了？这就促使早在清初就已盛行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勃兴。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来这种思想是早期儒学的传统。儒学自孔子创立起，就以修齐治平、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然而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专讲“性与天道”，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的倾向，宋明理学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明末的王守仁后学，束手游谈，几近狂禅。因此，南宋以下，经世致用思想进入了它的蛰伏期。

经世思想具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特点，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处在清中叶乾嘉考据学极一时之盛的时代，传统

“‘经世’的意识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①。一般说来，社会平稳安定，封建专制统治强劲有力时，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封建专制统治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意识就会活跃起来。

清初，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一些学者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深感空谈误国，于是大力提倡“实学”。“实学”的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它是从批判宋明理学中产生的。早在明代中期，实学就已出现，当时的代表人物有罗钦顺、王廷相。他们认为，王守仁的“格物致知”是“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②。禅学与儒学不同，一为“虚”，一为“实”，岂能融为一体？世界上一切皆“实”，人的心性要通过道德修养，才能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仅懂得，还要付诸实践，经世致用。清初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王夫之等是杰出代表。面对明末空疏的学风，顾炎武沉痛地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③为此他主张：“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④他遍游北方，了解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写出了规切时弊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李颙则认为：“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8 页。

（明）罗钦顺：《困知记》，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9 页。

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道》，《日知录》卷 7，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顾廷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1 页。

女耳 亦可羞已！”

进入 19 世纪，清朝全盛时期已过，官场的腐朽，社会的衰败，又一次触动朝野有为之士的心弦，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都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弥漫。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便成了统治阶层应付这个困境的基本思路。

当然，此时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还与道光皇帝的提倡有关。道光帝即位之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方面整饬内政，一方面呼求经世之才的出现。他认为“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②，指出“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③。因此，他反复强调“士不通经 不足致用”，也积极提倡经世致用。道光帝的提倡激起了士大夫们趋之若鹜地从纯学术转向经世之学。

这一时期，盛倡经世致用的人很多，他们大致由三种人物构成，分别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的三个层次：一是有着清正官声的封疆大吏，如陶澍、贺长龄、徐继畲、林则徐等，林则徐是他们的代表；二是究心经世之务的下层官吏，如徐松、姚莹、魏源等，魏源是他们的代表；三是科场蹭蹬、后以著述影响世人的学者，如包世臣、沈垚、龚自珍等，龚自珍是他们的代表。三类人物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以自己的改革实践及思想言论促使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

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李颀：《二曲全集》卷 7，扫叶山房民国八年（1919 年）石印本。

《清宣宗实录》卷 351，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版，第 17、20 页。

1. 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揭露时弊，盛倡改革。

士林风气的衰恶，是“经世”派人物最感痛心的现实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士习的衰恶直接压抑了人才的辈出，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而这一现象又是由于学术思想的锢蔽和科举制度的败坏造成的。他们在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汉学”时说：“乾隆中叶后，士人风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①对于“宋学”，他们也毫不留情。他们指斥理学家是“近于鄙俚而不免语录之习”^②。腐朽的科举制则使人才枯竭已达极点，诚如龚自珍所说的那样：“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阉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

对于官场的腐败贪黷，他们同样也给予揭露。管同说，今日的官场风气，“其弊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趋，无所不至。惟好谀，故下之于上，阶级一分，则奔走趋承”^④。

正是由于看到了清廷的腐朽黑暗，在他们的笔下，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日之将夕，悲风聚至”，整个社会“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⑤；“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喑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⑥。

当然，经世派揭露时弊，甚至预言“山中之民”将起，并不是真的诅咒清王朝尽快地灭亡，而是激起尽快振作。他们强

沈垌：《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8。

② 刘开：《上汪瑟庵大宗伯书》，《刘孟涂文集》卷4。

⑥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8页。

管同：《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4。

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安吴四种》卷8。

烈要求立即实行“更法改制”，呼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①，希望通过封建王朝行之 2000 余年而有效的自我调节机能，以正人心，以变风俗。在这方面，经世派中手握实权的能臣良吏们躬行践履，孜孜以求，取得了不少实绩。他们改革漕运、整顿盐务、开浚河渠、兴办书院、奖掖人才，力所能及做些清理积弊、利国益民的修补工作。经世派中的议政人物或者投靠在他们门下，襄助其事，或者著书立说，倡言变法，在学术上一反“汉学”、“宋学”与社会实际脱节的风气，研究实际问题。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证词章，而是留意稽查历代典章制度、治乱得失、天下利病，把通经与致用结合起来，把治史与察今结合起来，不为空谈，不图虚名。

2. 了解夷情，睁眼看世界。

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上国打得损兵折将，失地赔款，这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出现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热潮。

林则徐在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②，组织人编译《四洲志》和《华事夷言》。魏源编写了明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姚莹根据英人颠林口供编写了《英吉利图志》、《英吉利纪略》，并利用出使西藏的机会，“就藏人访西事”，著《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则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及风俗习惯等情况。

姚莹在谈到《康輶纪行》的创作动机时，曾说过：“欲吾中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页。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74 页。

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书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① 魏源也明确地宣称，《海国图志》“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可见他们“喋血饮恨”发愤著述，完全是为了“知彼虚实”，“师夷长技”。也就是说，只有真正了解对手，学习他们的长处，才能更有效地抗击侵略。

鸦片战争过后，清朝统治者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思想无疑是黑暗夜空的一道闪电。这种思想比那些“惟以利夷为争”的投降理论和“中国之御四夷也，来则抚之，贰则绝之，此不易之道也”^③的谎言空论，不知高出几许。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与挑战而自我更新的结果，这种更新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作为“师夷长技”的中介，导致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热潮的兴起。

二、地主阶级改革派对世界的了解

（一）林则徐睁眼看世界

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为批评时弊、倡言改革、提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8，安福县署清同治六年（1867年）刻本。

《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汤彝：《绝英吉利互市论》，《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985页。

倡实学，更表现为对夷情极为关注，开眼看世界。早在乾、嘉之际，就有学者对外国情事进行过简单介绍。乾隆年间，郁永河著《裨海纪游》指出：“吾人所居，自谓中华大国，未免见大言大，不知大本无据。”中国一区，道里虽广，若以天枢揆之，其实偏在东南。”因此所谓“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①的观念是不正确的。道光年间的何大庚在其《英夷说》一书中，对英国殖民者不无忧虑地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骖騫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盛，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②而道光十二年（1832年）萧令裕所著《记英吉利》，不仅对英国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而且还看到了西方殖民者在争夺殖民地斗争中是存有种种矛盾的，从而依据古代对付“夷狄”的办法，提出了“使相攻击，以夷伐夷”的主张。

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正是对这一经世致用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光大。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青年时代起，林则徐就研读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经世致用著作。他13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先后在闽县（今福州市）、厦门任过衙门文书，教过私塾，以后从道台一直累官至

郁永河：《裨海纪游》，《昭代丛书续编》戊集卷28，道光癸巳年世楷堂藏本，第25～26页。

何大庚：《英夷说》，《海国图志》（百卷本）卷15，清光绪六年（1880年）邵阳急当务斋刻本。

巡抚。1837年任湖广总督，与龚自珍、魏源交好，同议时政，提倡经世致用，呼吁禁绝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前（1838年12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1841年5月调离。在粤期间，先任钦差大臣，后兼两广总督，是反侵略斗争第一线的政治决策人物和军事指挥人物。在这之前，林则徐对西方情事的了解，并不比普通官员更多。他刚到广东时，曾误以为外国人离开了茶叶、大黄，即无以为生；他也曾相信英人腰直腿硬，上岸即无能为力。但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思想核心，促使他不囿陈说。他相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认为只有“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①。于是，他千方百计了解对方，了解世界。

林则徐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里面不仅有月份、数字、外币的英语译音，而且还有驻粤领事及其姓名和有关词语的英语译音的记录。林则徐还曾亲自接见遭风船破遇救的英国人，不但向他们询问英军、英舰的情况，还将致英王书的英译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

稿请他们校勘。他又亲临澳门，实地调查外人情况，从而认识到澳门华夷杂居，各国夷人都有，见闻最多，必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①。通过各种途径，他在短时期内即了解了许多情况，并运用国际法，与拒不交出杀人凶手的义律进行了说理斗争。当他估计到英人会因严厉禁烟进行武装挑衅之后，就积极加强海防，在广东沿海各扼要之处添设炮台，加强防卫。他奉道光之命断绝中英贸易之后，预计到义律会寻仇报复，就在广东沿海加强战备，“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②他知道敌人的长处在船坚炮利，就注意收集造炮技术与造船资料，着手仿制。他知道清军腐败，缺乏战斗力，就切实进行整顿，并招募乡勇水勇作为补充。因此，他的知己知彼，目的全在于“制夷”，即战胜英国侵略者。

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在中国社会刚刚步入近代历史的那个特殊年代，自然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首先，他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9世纪40年代前后，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上自皇帝，下至文武大臣，个个闭目塞听，妄自尊大，正如魏源所说：“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③甚至可笑地认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1839年《广州周报》曾经评论说：“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至今仍旧不知西边。”^④在这种举国昏睡的情况下，林则徐率先将目光投向域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其次，他开始摒弃了传统的夷夏观，认识到“外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4页。

魏源：《圣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9页。

《澳门新闻纸》1839年12月14日。

夷”也有自己的长处。特别是他在同外国侵略势力的接触和斗争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天朝”并不是样样优于“外夷”，其船不如“外夷”坚，其炮不如“外夷”利。第三，林则徐开始摒弃盲目自大的态度，产生了“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的明确认识，开近代向西方学习之先河。

（二）林则徐对西方情事的译介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后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编译，希望“察其短长而御之”。这项工作一直到1840年11月他被革职后，从未间断过。当时大量翻译的英文资料涉及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和时事知识，积累的材料相当丰富，主要是有关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情报。

林则徐的译书译报活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选译员。林则徐不懂外文，“大清国”向无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而当时的广州替外国商人担任通事的人外文水平不高，文化素养很差，不足以胜任翻译报刊的工作。林则徐于是打破常规，大胆起用一批身份卑微、地位不高的通事、引水等通晓外文的“善译之人”，让他们在行辕内翻译西方书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这样记述道：“林钦差聘用了四个当地人，他们全都会讲英文。第一位是个年轻人，在槟榔屿和马六甲受的教育，多年受聘于北京政府。第二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是在印度塞兰普尔受的教育。第三位也是一个年轻人，他一度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学校读过书。第四位也是青年，他是在中国受的教育，他

能正确而流利地阅读与翻译报刊上的一般资料。”^①这些人中，有在南洋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侨青年，有在美国念过几年书的留学生，也有在教堂里熏染多年的基督徒。一个翻译班子最终建立起来。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即亚孟、袁德辉、亚林、梁进德等人。

亚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国人。早年在印度塞兰普尔一所教会学校念过 10 多年书，并参与过英国浸会牧师马什曼译述《圣经》，1829～1831 年间从塞兰普尔回到广州。他是林则徐赴广州时随带的通事，曾在四译馆工作。据裨治文记述，亚孟的外文水平是林则徐 4 个译员中最差的。

袁德辉，小名小德，原籍四川，天主教徒，曾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读过书，通拉丁文，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1825 年他因成绩出众获英华书院的奖学金。他能说一口官话和写一手好字，英文造诣很深，曾编写过一本《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的大学用书，由马六甲一家基督教书局出版。鸦片战争前十年间，他长期在北京理藩院工作，翻译有关外交文件。1830 年夏，袁德辉被清廷派往广州收集外国书籍，1838 年又到广州，1839 年春被林则徐聘入府中担任译员，曾译述过林则徐、邓廷桢、怡良 3 人联合给英女皇的信。^②据《中国丛报》报道，袁德辉是林则徐主要的译书者。

亚林，早年留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地方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部的学校里念过书。他 1825 年由美国返回广

[美]裨治文：《鸦片贸易危机》，载《中国丛报》第 8 卷第 2 期，1839 年 6 月号。

参阅 [美]威廉·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276 页。

州，在外国商行里教职工英文，1839年受聘任林则徐的译员。

梁进德，即亚秩，广东高明人，中国第一位传教士梁发的儿子。1823年由马礼逊施洗入教，是中国第一位从孩提时期即受洗入教的人。他自幼随裨治文学习英文及宗教知识，在澳门马礼逊学堂就读，后被广州洋行商人聘为译员。林则徐1839年3月24日下令“夷楼工人全行撤退”时，被林则徐手下的密探侦悉，后许他担任待遇优厚的译员工作。马礼逊教育社第三年度报告里指出，梁进德是《四洲志》的主要译者之

①

参加林则徐翻译工作的，除了以上4名译员外，可能还有一位名叫陈耀祖的译员。据林则徐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初一致怡良函中特推荐此人说：“闻有陈耀祖者，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译。”^②但具体情况不详。还有若干外商、传教士、教师、医务人员也为林则徐审定译稿、翻译和介绍资料，其中就有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美国传教士医师伯驾（James Parker）、英华书院校长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杉达”（Sunda，又译为“巽他”）号轮船医生喜尔（Dr. Hill）。

此外，林则徐还把曾在外国商馆中服役的两个中国厨师和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里工作的一些中国人招入衙署，以备咨询。林则徐还经常与留心海防的地主士人进行切磋，像张维屏、梁廷枏、俞正燮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林永保：《论林则徐组织的译译工作》，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137页。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的四文书刊，内容相当广泛。

首先是《澳门新闻纸》抄本 6 册，约 10 万字。此系林则徐主持西文报刊摘译的汇编。《澳门新闻纸》的取材，过去一般认为系译自裨治文所办《中国丛报》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旧译名《澳门月报》）但经过译文原文对照，事实并非如此。现存《澳门新闻纸》抄本主要源自当时广州商馆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几本周刊，一是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办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1827 年由美国人伍德——英文名为 W. W. Wood——创办，初为月刊），逢星期二出版；二是英国“自由贸易派”，即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三是《新加坡自由报》，逢星期四出版。除此之外，还有少量为印度孟买出版的报纸。所摘译的报刊起于 1838 年 7 月 16 日，迄于 1840 年 11 月 7 日，按时间顺序类辑。内容包括对中国的报道、评论，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映以及英印鸦片生产、税收、贩运和暴利的情况，英、美、法、俄等国的动态等，事无巨细地介绍了洋人的生活起居习惯。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筛选加工而成为《澳门月报》，包括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 5 辑。当时，林则徐曾抄写数份分送邓廷桢、怡良等同僚参考，还把某些部分附奏进呈给道光皇帝。

其次是《华事夷言》录要，约 1.4 万字，收在《海国图志》第 83 卷。它主要摘译自 1836 年伦敦出版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况》一书。著者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系英国在东印度公司时期专驻广州的“大班”，后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是个老“中国通”。此书主要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同时也包括英国人

对中国问题的零星意见，对禁烟抗英的斗争有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华事夷言》录要也可能辑译了其他书刊的一些内容，比如 1939 年伦敦出版的地尔洼（A. S. 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1839 年 12 月 16 日，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在天后宫接见在琼州文昌县遭风遇难的“杉达”号幸存船员，该船医生喜尔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他交给我们一份地尔洼先生作的小册子和另一本撕去封面的关于中国的小册子（我想是德庇时作的）。他要求我们阅读从两书中摘出的几段。两书中有几部分已经译成中文，贴在原文所在的书页上。”^①地尔洼是剑桥大学三位一体学院布道士，他指责“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要求国会进行公开调查，反映了“自由贸易派”资本家的思想。正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林则徐知道了英国人也有反对鸦片贸易的，因而坚定了对“良夷”、“奸夷”加以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

第三为《滑达尔各国律例》，简称《各国律例》，约 2 千字，摘译自滑达尔的《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则》（*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一书。滑达尔（Em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 年），又译瓦特尔、万忒尔，瑞士人，所著《国际法》出版于 1758 年，曾风行欧洲，是当时欧洲外交家广泛使用的一部标准国际法手册。该书原文为法文，不久出版英文本。林则

徐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正是从奇蒂（J. Chitty）的英译本中摘译的。《各国律例》最初编入《四洲志》，魏源选择其中若干段辑入《海国图志》六十卷本的第52卷，后又辑入百卷本的第83卷。在《海国图志》百卷本第83卷中有两份译文，一份为伯驾所译，一份为袁德辉所译，有一段是重复的。伯驾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由此开始了与林则徐的交往。伯驾在医院年报第6565号病案中写道：“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一八三九年〕七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①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伯驾确曾参与了翻译《国际法》的工作。但美国学者徐中约将滑达尔著作的英译本同伯驾意译的汉文本作了比较，“看出这位美国人不大能够表达滑达尔行文的明白流畅。”^②这或许也正是林则徐再让袁德辉摘译滑达尔《国际法》的原因。从《海国图志》中收集的译文来看，其内容涉及走私问题、遵守所在国法律、战争法问题等，其中有关战争法的内容，如战争权利，甚至涉及了正义战争的理论。这些内容扩充了林则徐的西方法律知识，使他在处理林维喜事件中始终能对义律的狡赖进行理直气壮地驳斥。

第四为《洋事杂录》约2.1万字。系林则徐在组织翻译

陈原：《林则徐译书》，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

〔美〕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外交侧面，1858~1880》，马萨诸塞州，剑桥，1960年，第123~125页，参见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编《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第107页。